

近代滇史探索

谢本书 著



近代滇史探索

谢本书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惠铨

杨 澄

封面设计：陈永乐

近代滇史探索

谢本书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43,000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22—00103—4 /K·31

统一书号：11116·206

定价：2.25 元

前 言

我出生在四川，大半辈子都是在云南度过的。在云南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老师们给了我有益的帮助，正是他们孜孜不倦的教诲，使我得以步入史坛。我的老师，如方国瑜、江应樑、张德光、纳忠、杨堃、李埏、李为衡等教授，我是难以忘怀的。

在我步入史坛以后，给我影响较大的专家学者，名单还可以开出几页纸。然而，在这些众多的专家学者中，我要特别提到当代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黎澍研究员。在一次偶然的会中，黎澍看到我写的一份讲稿，即把我从昆明借至北京工作，那时我年仅二十八岁。而在这之前，我们并不相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给我的帮助和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中国近代史的知名学者章开沅教授，也是对我有影响的专家之一。黎澍、章开沅、金冲及曾分别为我著的三本书写了序言，鼓励和鞭策之词，使人激励。在我的同窗好友中，许多同志的帮助，也是令人感动的。

这就是说，个人在史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一点工作，除了党的正确指引外，还有许多老师和同志的帮助。这里所收的论文，虽然署的是个人名字，却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和集体的智慧。

近年来，我发表的论著，虽然范围较广，却没有超越“史学”的范围，并且侧重于中国近代历史（包括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身处云南，为了“扬长避短”，我又把研究重点放在近代历史与云南有关的问题上。云南地方近代史就逐渐成为我的科研重点之一。

这个集子，比较集中地编选了一九七八年以来，公开发表的

与云南近代历史有关的部分探索性文章，故取名《近代滇史探索》。

应当承认，即使是云南地方近代史，涉及的领域还是比较广泛的。文集所收文章，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篇篇深入。这个集子所收文章涉及的范围，首先是围绕云南辛亥革命、护国运动问题展开的；其次是论述有关西南军阀史、太平天国时期的云南起义、昆明“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等问题的。有两篇综述性的论文，则排列在前面；其余的文章，基本上按类别安排。

这些文章虽然主要是从近代云南历史研究的角度展开论述，然而它们涉及的问题却与全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要提到的是护国战争。护国战争是从云南开始的，它成了近代云南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和爱国主义斗争中值得自豪的事件；然而，护国战争及其影响，却大大地越出了云南的范围，成为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

文集所收的文章，除必要的校订以外，不加修改，以保持原来的面目。注释中注明的未刊资料（包括档案），后来大部分已经用各种形式发表；注释中提到的书籍版本，是当时能见到的，其中一些书籍后来又出了新版。这些都是应该在这里说明的。

近代云南地方史的研究，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未能触及，已经触及的问题还有待深入。这里编选的文章，只是抛砖引玉，难免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文集的出版得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帮助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谢本书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昆明

目 录

前言	(1)
近代云南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三次高潮	(1)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特点	(13)
论李文学起义的特点及其政权性质	(25)
《哀牢夷雄列传》应当可信	(33)
再论蔡锷	(46)
蔡锷与清末广西干部学堂风潮	(59)
蔡锷与辛亥云南起义	(65)
辛亥起义后滇军入黔问题探讨	(72)
辛亥滇军入川问题	(87)
民国初年的云南财政	(96)
略论1912年的建都之争	(101)
云南杨春魁起义——“二次革命”的尾声	(114)
蔡锷与黄兴	(117)
护国运动史的几个问题	(120)
梁启超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36)
论“护国演说社”	(149)
护国战争的结束及其善后处理	(160)

护国运动史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171)
论唐继尧·····	(186)
关于西南军阀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216)
孙中山与西南军阀·····	(225)
西南军阀形成的重要标志·····	(242)
略论南北军阀之异同·····	(256)
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	(266)
“五四”运动在昆明·····	(279)
白族学者兼政治家周钟嶽·····	(296)
云南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	(300)
抗日战争时期龙云对昆明民主运动的支持和保护·····	(312)

近代云南人民爱国主义 斗争的三次高潮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崇高的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它一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巨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①特别是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表现更为突出，更为鲜明。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和幸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前途而斗争，构成了这一时代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历史内容。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运动史。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深受外国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之苦，当时的云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正如在一九〇五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接见云南留日学生时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已致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袭之下，易于鼓动奋起。”^②云南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斗争中，从来没有屈服过，反而激起了他们反压迫的更大的爱国主义热情。从杜文秀起义，

李文学起义，反对英法的侵略活动，辛亥、护国起义直到一二·一运动和一九四九年云南起义等，都继承和发扬了云南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近代云南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中，曾三次高涨。一次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二次是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时期，三次是抗日战争和一二·一运动时期。这三次高涨、集中反映了近代云南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的大起义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首先爆发于广西，两年后，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并且建立了以天京（今南京）为都城的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接着，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规模不等的许多次起义，这样就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在云南，与这一革命运动相配合的是最初爆发于一八五三年、后来延续到一八七六年的各族人民的大起义。这是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爱国主义斗争所掀起的第一个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的云南，政治经济状况更为恶化。战争的赔款，事实上被转嫁到人民群众的身上。而云南地方政府为了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抗，又不断用兵，仅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一年就用兵十八次。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既役使了众多的人力，又耗费了巨额的军费。当时云南的军费支出，每年耗费白银一百万两左右，而同期云南的财政收入仅有七十万两。^③赔款、军费和统治阶级的挥霍滥用，又以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转嫁到各族劳动人民身上。因而，云南出现了“耗财之途广，而生财之道滞”，“摊派加捐，上下交困”的局面。^④使云南这一时期成为全国赋税最高的地区之一。其次，外国列强的入侵，鸦片的大量输入和

引种，导致白银外流，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加之清政府实行“以汉制夷”、“以夷制夷”的反动政策，挑动民族仇杀，其结果造成“民不堪其苦”的局面。^⑤官逼民反，“滇省盗风日炽”，以至“遍地皆匪”。^⑥清政府惊呼，“捕之不及，歼之不能。”^⑦

一八五三年，在云南哀牢山区镇南州（今南华县）秀水塘村，爆发了彝族农民杞彩顺，杞彩云兄弟领导的有数百彝、汉农民参加的反清起义，杀了汉族庄主（地主），抗击了地主武装的进攻，并一度围攻和占领了镇南州城。后来转入山区，坚持武装斗争，使起义军扩大到两千余人。这就拉开了近代云南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第一次高涨的序幕。一八五五年秋，哀牢山中段镇沅、墨江一带爆发了哈尼族农民田四浪的反清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余人。一八五六年五月，在彝族农民李文学领导下，弥渡县瓦卢村爆发了有五千人参的反清起义。李文学起义提出了“铲尽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的口号，锋芒直指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同时制定了“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土地政策；执行了“不别夷汉、汉夷同利”的民族团结政策；坚持了“应援天国”，顾全大局的方针。^⑧因此起义十年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兵威所至，差不多达到了半个云南，给清朝反动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起义军曾直接控制的区域，包括哀牢山上、中段和下段的一部分，以及蒙乐、六诏山的一部分，据有相当于现今南涧、弥渡、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沅、新平、元江、墨江等十个县的全部、大部或一部，总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五十多万，彝、汉、回、哈尼、傈僳、白、傣、布朗、苗等民族的劳动人民参加了起义队伍。起义延续了二十年之久（1856—1876），它所建立的政权——蜜滴帅府，也坚持了十八年之久（1856—1874）。李文学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第一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之大，意义之深，是云南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所无法比

拟的；与同时期云南杜文秀起义相比，其规模虽稍次，其意义却较接近。

一八五六年九月，滇西爆发了回族杜文秀领导的更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这次起义以回族为主，建立了坚持十八年之久（1856—1874）的大理政权，杜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大理政权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口号，^⑨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等方针。^⑩参加杜文秀起义的有回、汉、白、彝、纳西、景颇、傣、傈僳、怒等各族人民。起义高潮时期，其势力控制的地区，东起楚雄、广通、元谋、禄丰；南至景东、云县、威远；北抵剑川、丽江、鹤庆、永北；西达龙陵、腾越（腾冲）、永昌，云龙，先后攻占五十三个县。尽管，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的天京为清军攻陷，形势逆转，杜文秀为了“救劫救民”、“安回安汉”^⑪，于一八六七年，组织了二十万兵力，由十八大司率领，分兵五路，东进昆明，围困昆明达三年之久，给清朝在云南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同时也暂时遏止了英、法侵略者对云南的野心。起义军表现了“自古罕有”^⑫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杜文秀、李文学起义的影响和号召下，云南全省几乎所有各府、州、县都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反清起义，这些起义以各族农民为主体，最后终于汇合成了云南各族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人民大起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在云南掀起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近代云南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第一次高涨。这次起义最终虽然失败了，然而起义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起义军战士英勇奋斗的精神，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义表明，云南各族人民为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进行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它为近代云南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

样，对云南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时期 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反对列强侵略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从未间断过，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时期，进一步展现了云南人民爱国的革命斗争精神。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同盟会，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等数十人立即加入，并创立了同盟会云南支部，积极领导云南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创办了《云南》杂志，“以近代之历史事实、政治学说，灌输民族、民权主义”，^⑭宣传革命思想。大声疾呼：云南者，云南人之云南也。“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⑮一九〇八年，同盟会在云南领导了两次反清武装起义，一次是河口起义，一次是永昌（今保山）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它却教育了人民，并为辛亥云南起义作了准备。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嗣后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川黔动摇，云南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唐继尧、刘存厚以及蔡锷等先后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策动昆明起义，推举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⑯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夜，昆明辛亥“重九”起义爆发，经过一天的艰苦战斗，终于获得胜利，控制了昆明，云南全省传檄而定，迅速光复。十一月一日，起义官兵组织“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即“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云南地方政权。辛亥昆明起义有其重要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武装起义突出。辛亥昆明起义是经过

严密的组织，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在起义的战斗过程中，革命志士牺牲一百五十余人，负伤三百余人；敌方死者二百余人，伤者百余人。^{①⑥}据研究者认为：

“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①⑦}由于是经过战斗夺取政权的，因此对旧政权的打击相对彻底，这对云南政府的建立及其实施的政策，不能不产生某种积极的影响。第二，革命旗帜鲜明。起义后建立的云南军政府发布的《讨满洲檄》，重申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声明：“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①⑧}在辛亥起义各省发布的宣言或檄文中，重申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是罕见的。第三，改革初见成效。军政府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矣。”^{①⑨}这些改革，大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使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财政变成了略有节余，^{②①}并使“廉洁成为一时风尚。”^{②②}第四，出力支援邻省。云南起义成功后，云南军政府派出滇军，先后支援四川、贵州和西藏，其出发点是为了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支援正在进行的革命。辛亥云南起义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然而它终于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两百多年的反动统治，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云南后来的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几年以后，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目的的护国战争，首先爆发于云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辛亥革命后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窃据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竟然大搞复辟，帝制自为。开起倒车来了，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及其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决不允许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打倒袁世凯成了

举国一致的目标。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除了一小撮封建余孽和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云南人民以及受辛亥革命熏陶的滇军军官也不例外。革命党人和滇军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武装反对帝制，制订了讨伐袁世凯的计划，护国战争正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翼——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蔡锷、唐继尧等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席卷全国的人民群众反袁浪潮的基础上发动的。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护国战争首先爆发于云南，这是云南人民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件。它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意志，更表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云南宣布独立讨袁之日，昆明“各界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②云南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组成了护国军三个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向四川进发；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向广西进发；唐继尧以云南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蔡锷所率护国军第一军在四川前线，抗击了北洋军的主力，激战四十余天，几乎使川南全部化为战场。尽管力量悬殊，但饱含爱国主义精神、为正义而战的士兵们，“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得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阻”^③。继贵州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独立，广西在三月十五日独立后，护国军经过艰苦战斗，于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川南前线反攻得胜，北军损失惨重，被迫停战议和。袁世凯不得不在三月二十二日宣布撤销帝制，于六月六日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一死，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也就无形结束了。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革命战争，这就是所谓“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

讨袁，共和再现。”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粉碎了袁氏复辟帝制的阴谋，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避免了历史更大的倒退；它集中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和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表明任何复辟封建帝制的企图都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云南各族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再一次得到了体现，这是近代云南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第二次高潮。

从抗日战争到一二·一运动云南人民 反侵略争民主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云南的历史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九二六年，中共云南省委（特委）建立以后，更使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起色。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云南省工委，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云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云南抗日救国先锋队”（抗先）、“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学联）等公开的和秘密的抗日救亡组织。《救亡》、《火山》、《南方》等抗日救亡刊物，也相继出版。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云南人民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充分的体现，抗日救亡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立了公开的“云南抗敌（日）后援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新的局面，昆明被誉为抗日的“民主堡垒”。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继尧堕落为滇系军阀的头子以后，滇军

也成了军阀角逐的工具。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滇军继承了云南辛亥、护国的光荣传统，投入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其时，龙云将云南军队编为一个军（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下辖三个师（其中第一八四师师长为张冲）三万余人，开赴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一九三八年三月，徐州会战开始，六十军在台儿庄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坂垣、矶谷两个加强师团的进攻，坚持了二十七天的阵地战，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大大地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情绪。这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战场的首次大胜仗。日本侵略者也第一次承认在华失利。当时报纸报道：“敌昨始承认，台儿庄之败。……此当为第一次。”^②在台儿庄战役中，滇军付出了重大牺牲，六十军“全军伤亡惨重。以第一八三师而论……，官兵伤亡达到全师四分之三。第一八二师情况相似，可谓血战矣。”^③

为了继续抗日，争取民族解放，云南三迤各族子弟，纷纷加入云南再度编成的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投入抗日战争的伟大行列，为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

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牺牲，一千八百多万人献出了生命，人民财产的损失更不可计数，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此时，蒋介石反动派却采取了“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方针，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因此，在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提出了反对美蒋发动内战的口号，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说，这次国统区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是“以昆明罢课为标志”。^④这次民主运动再度显示了云南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几个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等问题，到会者

有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六千多人。在讲演进行中，有自称为“王老百姓”的国民党特务查宗藩，强行登台，大放厥词，说什么“内乱非内战”，遭到听众抗议，迫令下台。同时，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向会场上空发射步枪、机关枪和小钢炮，进行恐吓。散会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交通，使数千群众受阻达数小时之久。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捏造消息说：“西郊匪警，昨夜枪声”，诬蔑群众为“盗匪”。另方面，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口出狂言，狂吼什么：“学生们有在墙内开会之自由，我们也有在墙外放枪之自由。”^④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昆明三万学生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号口，并要求追究开枪责任，公开道歉，保证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对爱国学生采取了凶狠残暴的手段。

十二月一日，大批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暴徒，分途围攻西南联大、云大、师院，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等四人，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教育了广大群众，也引起了全国各地的震动。全国各地纷纷声援昆明的爱国学生运动。十二月九日，延安各界集会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发表演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⑤昆明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严密了自己的组织，加强了团结，继续进行斗争。在广大人民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用“停职候处”的名义把云南代省长李宗黄及关麟征两名主凶调离